

目錄

編者序		II
潘宗光教授訪談錄	潘宗光 口述 韓孝榮 訪問	7
人文學科與通識教育——理念與實踐	林稚暉	19
科技發展中的人文領袖	李建深	35
糅合人文與理工的嘗試——從唐文治棄官從教說起	劉繼堯	61
從《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看中晚唐的製茶與飲茶風尚——兼釋「餅茶」與「團茶」、「喫茶」與「啜茶」的關係	羅永生	81
從羅雅各 (Jacobus Rho) 舊藏手澤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天體運行論》(1566 年版) 到康熙、乾隆朝演示哥白尼學說的西洋天文儀器——以勒默爾 (Ole Christensen Römer) 設計、伊薩克·蒂雷 (Isaac Thuret) 製造的「日心說」行星運動天文機械裝置為中心	馮錦榮	97
「歇斯底里」、生育恐懼與優生威脅——醫療人文視閥下的張愛玲《金鎖記》	張贊	165
社會主義建設者在路上——1949-1965 年間中國社會主義電影中的鐵路旅行、工業化與社會工程	張宇	185
數字人文——出入「文」、「理」之間	陳婧	219
數位人文與歷史研究的一點反思	張維玲	241
雙文並重、三語共榮——記中文及雙語學系對香港語文教研的貢獻	陳瑞端 李楚成	269
漢語與華人社會——泰國華人社區的形成與漢語的傳播	梁慧敏	281
漢文筆談研究概述	黃得森 李楚成	303

編者序

不論是在教學中，還是在研究方面，人文學科與理工學科的相互影響和結合都在日益增強。作為在理工大學任職的人文學者，我們感到有必要、也有義務對於在理工環境中從事人文領域教學和研究的經驗作一番回顧，對於文理結合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些反思和展望，而香港理工大學 85 周年校慶、香港理工學院升格為香港理工大學 30 周年和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成立 16 周年，則為我們提供了把各自的回顧、反思和展望集為一冊的契機。

我們的回顧和反思聚焦於兩個主題，即如何在理工大學教授人文課程，以及如何在教學和研究中糅合人文與理工。論文集中各篇文章所觸及的具體問題包括：為甚麼理工大學也不可不設人文科系？為甚麼要提倡全才教育、通識教育？在理工大學教授人文課程需要注意哪些特殊問題？現代科技的發展對於人文領域教學和研究有哪些影響？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科的發展歷程如何？論文集的作者主要來自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和中文及雙語學系，但也有受邀賜稿的兄弟院校同事。

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潘宗光教授是一位對人文學科深感興趣的化學家，並在擔任香港理工學院院長和香港理工大學校長的 18 年間大力支持人文學科的發展。香港孔子學院和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的前身中國文化學系都由他分別在 2006 年及 2008 年推動創辦。本文集以對他的訪談錄為開卷之作實屬恰當不過。他在接受我們訪談時，回顧了創建中國文化學系和香港孔子學院的過程，並解釋了在香港理工大學強化人文領域教學和研究的初衷，以及人文學養對於他個人學術和職業生涯的影響。

另一位理工出身卻同樣重視人文教育的大學校長是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 (1889-1962) 教授。他強調人文教育對於培養具備完善的人生觀

和世界觀以及完整人格的理工人才的重要性。林稚暉的文章以梅貽琦的通才教育理念為出發點，回顧了通識教育發展的歷程。作者不僅分析了現代社會中人文學科的價值，還分享了他本人在理大從事人文教學的體驗。

如果說梅貽琦和潘宗光都是重視人文學科和文理結合的理工學者，那麼李建深和劉繼堯所撰兩篇文章的主角則是推崇理工學科和文理結合的人文學者。李建深認為，人文學者應該走出舒適圈，積極利用科技成果以及社會對於科技領域的巨額投入，努力創建新型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如此則人文學者不只能避免被邊緣化的困境，還有可能成為引領科技發展的領袖。劉繼堯的文章描述和分析了於清末民初擔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後先後改名為南洋大學堂、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和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的唐文治 (1865-1954) 如何從一位傳統文人轉型為一位提倡中西結合和文理交融的理工大學校長。唐文治辦學理念的核心，便是強調培養實業人才與傳承中國文化這兩種重要使命的合二為一。

科技史與科技文化是近年來得到迅速發展的融匯文理的交叉學科。本集所收四篇相關文章分別討論了自唐代至當代四個不同時段中的中國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的四個方面。羅永生的論文所關注的雖然主要是唐代的飲茶習俗，但也涉及當時的製茶技術，特別是散茶、餅茶和團茶的不同製作方法。馮錦榮的配圖長文以耶穌會士羅雅谷 (Giacomo Rho, 1593-1638) 所藏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天體運行論》(1566 年版) 及數架演示哥白尼學說的西洋天文儀器為中心，探討崇禎、康熙、乾隆年間哥白尼學說及相關西洋科學儀器在中國的傳播。馮文贊同哥白尼「日心說」早在明末即已傳入中國的觀點。張贊則從醫療人文的視角，以張愛玲 (1920-1995) 的小說《金鎖記》為個案，分析了中國文學和文化中「歇斯底里」的涵義，認為在現代中國的醫學、社會及文化等語境中，「歇斯底里」不僅是一種疾病，而且被建構為一種對婦女生育及優生學的威脅。張宇的文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製作的、與鐵路旅行相關的電影為主題，說明這些

電影如何通過將人的情感參與和革命、國家、工業化聯繫起來而助力建構對國家的想像。她重點分析的三部電影是《護士日記》、《昆侖山上一棵草》和《年青的一代》。

數字人文或數位人文是近年來日益受到關注的另一個文理結合的新領域。本集所收錄的兩篇相關文章，分別討論了運用數字人文方法研究古典文學和古代歷史的嘗試。陳婧認為「數字人文」這一術語的涵蓋面正變得越來越廣。她不僅描述了數位與人文結合的三種路徑，即以「數位」研究「人文」，「數位」與「人文」相結合和「數字」裏的「人文」，還特別介紹了數字人文研究在香港的發展。張維玲則以宋代歷史為例，討論在歷史研究中運用 CBDB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社會網路分析等數位人文工具的可能性和挑戰。她認為數位人文可能不僅能夠驗證、肯定既有的研究，而且可以修正或突破既有的認識。

文集最後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均涉及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學。作為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及雙語學系的第三任和第五任系主任，陳瑞端和李楚成集中討論了中文及雙語學系的發展歷程和定位。與大中華地區大多數大學的中文系不同，香港理工大學的中文及雙語學系一直以語言而非文學為研究和教學的重心。此外，雖然常常被簡稱為「中文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所關注的也不只是中文。在致力於中英跨語文研究和教學以及培養中英雙語和翻譯人才之外，學系也提供日語和韓語課程，以滿足香港社會對各類語言人才的需求。在研究方面，中文及雙語學系亦以文理結合見長，在言語治療、電腦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語言能力與大腦的關係以及神經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等跨學科領域，都已取得豐碩成果。

近年來，中文教育在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地，特別是鄰近中國、又有眾多華僑華人的東南亞，日益受到重視。梁慧敏運用古籍和當代兩岸文獻，包括專著、期刊和報刊等資料，概括分析了泰國華人社區的形成與發展，重點闡述宋代以降華人移居泰國的幾個階段、漢語的傳播、唐人街的現狀以及華文教學發展的曲折歷程等。作者認為，自 193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主要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泰國的華文教育受到壓制，但自 1980 年代以來，地緣政治的變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為華文教育的恢復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與泰國相比，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的朝鮮、越南和日本具有更悠久的使用中文的歷史，而筆談就是這一地區的中文使用者們在歷史上創造出的一種獨特的交流方式。黃得森和李楚成的文章討論了筆談對於東亞政治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並介紹了東亞歷史上豐富的筆談實例和當代世界中筆談的殘存形態，是對近年來學界有關筆談的研究成果的綜述。

本書的兩位編者都是比較傳統的人文學者，對於理工學科的了解比較膚淺，也未曾真正嘗試在個人的教學和研究中糅合人文與理工。之所以決定發起編輯這部文集，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我們認同文理結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們相信編輯這部文集會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而我們在編輯過程中的確受益良多。我們對於為文集出版提供資助的理大 85 周年校慶指導委員會以及慷慨賜稿的校內外同仁深表感激，也感謝在文集出版過程中為我們提供大力協助的香港理工大學出版社的黃振威博士。文集在香港理工大學正名 30 周年之際出版，甚為妥切，因為正是在獲得大學地位之後，理大的人文學科才得以快速發展，人文與理工的互動才得以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

2024 年 12 月

人文學科與通識教育 ——理念與實踐

林稚暉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大學應該培養怎樣的人才？這是無數高等教育前輩先賢曾經思考的問題。尤其在現今專業日益精細和分工越見明確的社會，大學怎樣培養人才、培養怎樣的人才，不僅是大學辦學的核心問題，也關乎學子日後如何發展事業、開拓人生、服務社會。本文從教育家梅貽琦(1889-1962)的通識教育理念出發，回顧其所論及的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培養目標和人文學科的意義，然後結合現代社會和就業的特點，講述人文學科對理、工、商、科學子而言的現實價值，最後以香港理工大學(以下簡稱「理大」)的「絲綢之路東段文化史」課程為例，分享有關理大開設人文科目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歷程的感想。

一、梅貽琦通才教育理念中之人文學科

早在百年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便曾提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份子的責任。」¹之後，梅貽琦精闢地指出大學教育的核心所在，其理念至今仍對大學的通識教育具有高屋建瓴的意義。

梅貽琦自1915年開始任教於清華大學，後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畢生致力於倡行和貫徹通才教育。集中體現他教育思想的〈大學一解〉和〈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等名篇一直被視為大學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的

經典之作。梅氏有見於當時「大學及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學科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²的教育方針，認為大學教育不應只是為大學生造就「出身」和「資格」，提出只有注重通才教育，才能培養真正有利人生和社會的人才。

梅貽琦倡行的通才教育目標在於塑造大學生的整體人格，培養人的「知」、「情」、「志」。他結合中國傳統儒家的大學之道和留美的經驗，認為學問的最終目標在於「明明德」與「新民」。人格培養是梅貽琦至為關心的目標。他對此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謂整個之人格，即就比較舊派之心理學者之見解，至少應有知、情、志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³可見，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一環，大學教育並非只局限在傳授實用知識，更應啟發學生的情志，使其明白己群關係，進而體己愛人，將來服務社會。梅貽琦對專才和通才的辨析正是由此出發，他認為：「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寄寓於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⁴其所指的「通才」，是指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對人生有全局觀，能篤定前進、建立起人生哲學、過好社會生活的人，而要達至這樣的方向，便必須對社會和人生有切實而深刻的感知和體認。這是某一實踐專業的知識難以成就的，必須廣泛涉獵和體察，不以專業為自己設限。

2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1929年)，見《中華民國教育法規選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頁46。

3 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1941年)，頁2。

4 同上，頁7。

1 蔡元培：〈教育獨立議〉(1922年3月)，收錄於《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頁585。

具體而言，梅貽琦認為「通才」應「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⁵他指出：「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分；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瞭解；合而言之，則於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⁶換言之，應做到不在知識上設限，凡事留心，且善於把握萬事萬物之間的關聯，具備融會貫通的能力。他認為：「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瞭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⁷

梅貽琦對培養理、工、農等自然科學的學生有特別的思考，尤其注重人文學科對他們的重要性。1943年，梅貽琦在〈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一文中再次強調：「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的學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⁸此處所指的「通才」，既是能在學科大類中做到知識融通（即文、理、工、農等學生應具備各自大類中多個細分學科的知識）的人士，亦指跨學科的綜合通才（例如理科學生涉獵人文學科，文科學生知曉工學、農學等），更是其一直以來致力於培養的具有完善人生觀、世界觀和完整人格的通才。梅氏尤其指出自然科學類專業的學生有必要對人文社會科學有所認知：「於工學本身與工學所需的自然科學而外，應該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

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瞭解。」⁹如此才能成為更善於思考的人，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

二、通識教育之發展歷程及人文學科之現實價值

通識教育在世界各個文明中的實踐由來已久，總體而言經歷了「通識——專業細分——通識與專業結合」三個發展階段。

近代所指的通識教育源於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 384 - 公元前 322) 提倡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理念，¹⁰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栽培人的理性和心智，引導人探尋真理。在西方，大學興辦之初強調的通識教育以語文、修辭、邏輯、算術、幾何、音樂及天文等「七藝」為內容。18世紀中葉，隨着工業革命帶來的科技進步和社會變革，西方社會對技術突破有進一步的期待和追求，故此學科細分和專業化日漸成為趨勢，理、工、商、醫等科目蓬勃發展，誕生出越來越多細緻的專門方向，這一趨勢延續至今。與此同時，文學和藝術等人文學科因被認為與工業化社會所強調的技術和利潤沒有直接關係，且目標難以量化、效用難以評估等原因而變得相對邊緣化。然而，專業細化和學科區隔的弊端隨之日漸顯現，在工業革命後期即已引起大學教育界的注意。1828年，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率先發表報告，重申大學教育的本質是「以古典人文教育為核心的『通識教育』」。¹¹20世紀初，包括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芝加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等多所以理工見長的頂尖大學陸續強調人文教育及文理平衡。

9 同上。

10 Paul Axelrod, Paul Anisef, Zeng Lin, "Against All Odds? The Enduring Value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Professions, and the Labour Market,"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1 (2) 2001: 47-77.

11 *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 (New Haven: Hezekiah Home, 1828).

5 同上，頁9。

6 同上。

7 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17。

8 同上，頁184-185。

中國古代的傳統教育亦是通識教育。《周禮》記載了「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相當於先秦時期的高等教育，涉及文化、藝術、算術及實用技能等範疇。可見，古代貴族及民間先進必須修習和掌握的綜合知識及能力，及後發展為以儒家經典為主的教育內容。近現代以來，中國的發展對工業需求亦日見增長。20 世紀 50 年代初，中國內地為配合國民經濟和工業化的需要，仿效蘇聯的辦學模式和發展方法，着力培養工程技術領域的專業人才，大批削減或拆分原來的綜合類大學，建設單科性專門院校，這一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雖有其時代合理性，但亦導致學科發展不均、重理輕文、知識分隔、技術主義等弊端，不利於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融會貫通能力。至 90 年代，高等教育領域興起有關素質教育的廣泛探討，促使人才培養理念從強調專業知識轉為重視綜合素質和基本素質。1998 年，教育部明確提出基本素質教育的含義：「大學生的基本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專業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其中文化素質是基礎。」¹² 此後，多所高等院校相繼增設人文類專業及研究院，向綜合性大學的方向進發。

香港各間大學的通識課程設計同樣經歷了多年探索，發展至今形成學科廣泛、課程多樣的狀態。總體而言，通識課程可分為兩種模式：分配模式（distribution model）以及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¹³ 前者即高等院校將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領域進行科目分配，規定學生在不同的學術範疇各修讀一定數量的學科。這種模式認為各領域的知識具有整體性，有助確保全體學生較均衡地掌握各學術領域的重點知識和方法，但若僅採取此種模式，難免會缺乏統籌各科目的主線，令學生對各個領域淺嘗輒止，僅作蜻蜓點水式的涉獵。核心課程則從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

和方法出發，擬定一系列能包含這些要點的必修課程，以確保全體學生通過系統學習，對相關基本知識、思維方法和必要能力有所掌握。此模式下設計的科目相互關聯，相輔相成，有助學生在學科之間融會貫通。目前，香港高校的通識教育多採用兩種模式並行的方式。

儘管通識教育強調文理結合和均衡，然而當中人文學科的意義和價值一直以來都並非不言自明。誠然，現今社會對技術和理工的需求整體而言大於文科，用人機構也期待掌握實用技能的人才來迅速達成可量化的目標，這些確為不爭的事實。大學是學子從學生生活向社會生涯過渡的環節，大學教育必然包含社會化訓練（如自主學習、團隊合作、領導能力等），更會傳授具有市場吸引力的專業技能，讓學子畢業後能順利就業、迅速上手，在社會上生存立足。因此培養專業技能可謂是大學的必然義務之一。

然而，人文學科的價值在新的社會環境和職業需求中同樣不容忽視。首先，現今的學科整合（又稱「跨學科」、「學科交叉」等）日益成為大勢所趨，具備跨學科思維方式和共通能力的人才越來越切合市場需求。理工學科往往需要人文知識來真正了解人的需要。例如，要在山林中設計一座民宿，除了需要建築學、土木工程、環境學、數學等基礎外，還需要在美學、歷史、古典文化、旅遊管理等方面有所認識。而理工學科的應用也拓展到人文學科，二者的結合碰撞出新的問題領域和探索方法。諸如文物古跡的發現、保護和修復等領域，離不開考古學、藝術學、材料學、大氣學等方面人才的合作；一些傳統的人文領域也借助大數據和計算機科學獲得新突破，例如古詩文的意象運用和書寫傳統、古人的社交網絡和行跡復原、古代經濟圈和物質品種流動軌跡等問題，都在大數據分析的幫助下獲得嶄新而清晰的探討思路。可見，理工與人文相結合的趨勢為學生就業擇業帶來更多新機遇。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高教司：《關於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教高〔1998 年〕2 號文件）（北京：教育部，1998）。

13 梁卓恆、李明：〈人文向度的科學通識教育：理念與議題〉，《教育學報》，第 48 卷第 1 期（2020 年），頁 23。

其次，學生在人文學科方面的涉獵和透過人文學科培養的一系列能力，也成為他們日後發展的軟實力。就學生個人而言，人文學科培養的口語及書面寫作能力有助增進他們的理解力和表達力，他們對人類文化及人際交往的理解和認知，也能在日後助其提升社會交往的感受能力和自我表現能力。就企業方面而言，越來越多傳統的資訊科技企業在具備一定水準的技術硬件之後，傾向於結合人文學科知識來突破發展瓶頸，或者需要從人文方面打開新的發展方向，更上一層樓。例如，大型科技公司的遊戲部門和影視製作部門特別青睞歷史及傳統文化領域的人才，因為他們可構思出既有厚實的歷史基礎、又能讓受眾沉浸於歷史氛圍的故事；網絡媒體的營運平台尤為重視具有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相關基礎的人才，從用戶心理出發，結合大數據計算，為用戶增強人際聯繫及推送適切的資訊，提供客製化的反饋和用戶體驗；香港部分大型金融機構亦傾向招納對中國內地發展有清晰了解、善於與內地交流合作的畢業生。可見，在分工精細和注重創新的資訊時代，企業的發展本身已突破技術門檻，相應地，其用人亦不局限於就某個崗位尋找對口專業畢業生。在此環境下，人文學科的涉獵也增加畢業生拓展就業管道的機會，有助其職業發展前景。

再者，人文學科對人一生的不同階段都有所滋養，能夠培養學生關心自己，關愛他人和社會，鍛煉敏銳的觀察力和同理心，讓他們具備堅韌的心智及關愛他人的能力。歷史、文學、哲學等學科凝聚了人類的情感和經驗，記載了人類世世代代曾遇到的困境和思考的問題。學生透過接觸這些方面的知識，於己，可在遇到困難時聯想起人類的智慧，即使未必能找到直接解決困難的方法，亦可從中尋得同情共感，明白自己並非一個孤島；於人，有助養成體諒和關愛的能力，在他人需要幫助和支援時給予適切的關懷。這樣的素養和心智有助學生成為一個堅毅、真誠、有愛心的人，在順遂時腳踏實地，失意時找到慰藉，自處時豐富內

心，與人相處時互相扶持。大學的人文通識課的一項重要意義就在於啟發學生體己愛人的心智，將學生引入人類豐富的精神世界。

三、理大的人文學科教學實踐——以「絲綢之路東段文化史」為例

理大原先偏重工商科技等學科，及後經歷了專科大學向綜合性大學的轉型。理大的本科教育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需要為基礎，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旨在「提供跨學科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的專業素養、思辨能力、以及有效溝通、解決困難、終身學習、價值引導等方面的能力，成為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全球視野的人。」¹⁴ 通識課程採取分配模式和核心課程結合的方式，旨在「透過綜合學科視野，培養學生的知性能力、全球視野、交流溝通能力和思辨能力」。¹⁵ 目前，理大的通識科目涵蓋四個範疇：「人性、人際關係及人類發展」、「社會、組織及全球化」、「歷史、文化及世界觀」、「科學、技術與環境」，每個範疇均設多個科目，學生需在四個範疇中各選修若干學分，以拓寬知識領域，突破主修專業的局限。這些課程注重培養文化素養、正向價值觀和知性能力，探尋人文、歷史、審美、科學素養等核心領域。在通識課程的內容方面，理大十分重視中國元素，將有關「中國」的科目作為人文通識課的重點，並設有修讀「中國研究」的畢業要求，以深化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本科生需完成「中文閱讀及寫作」和「英文閱讀及寫作」兩項語文要求。此外，理大積極與內地多所大學開展「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計劃」（簡稱「萬人計劃」）的合作，讓更多本科生有機會赴內地交流學習，了解內地與香港的緊密關係及發展機遇。

14 理大「大學核心課程事務處」網頁 <https://www.polyu.edu.hk/ogur/about-ogur/welcome/> 原文為英文，此處為筆者翻譯。最後檢視日期為 2022 年 5 月 3 日。

15 理大「大學核心課程事務處」通識課程網頁 <https://www.polyu.edu.hk/ogur/GURSubjects/CAR.php> 原文為英文，此處為筆者翻譯。最後檢視日期為 2022 年 5 月 3 日。

自 2022 年秋季始，理大的核心課程包括「中國歷史及文化」和「資訊科技」兩大類，涵蓋多門課程，且包含中英文閱讀及寫作要求。理大的本科學生須在這兩個核心大類中修畢一定學分，以培養對國家和民族的認識和認同感，並掌握適應社會需求的關鍵技能和共通能力。

「絲綢之路東段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astern Silk Road）課程屬於理大通識課的「歷史、文化及世界觀」類別，入選 2022 年新版通識必修的核心科目範疇。該門課程設有中英文兩個版本，且為與西安交通大學合作的暑期「萬人計劃」項目之一。修讀該門課程的學生來自全校各個主修專業，不要求具備相關基礎知識，修畢可同時滿足「中國研究」及「中文閱讀及寫作」或「英文閱讀及寫作」的學習要求。以下，我將從課程設計和教學實踐兩方面，分享這門課程如何服務理大的通識教育目標。

（一）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和教學是一個整體，學生「應學甚麼」和「如何學」應是教師「該教甚麼」和「怎樣教」的指引，教師的教學方法和課程內容安排都需因應學生的特點進行調整。在理大開設人文課程更需注意以下問題：本課程傳遞何種價值理想？培養何種關鍵能力？修讀的學生期待從中獲得甚麼方面的知識、文化素養和思考能力？課程如何使學生於修畢之後仍有所裨益，啟發其日後持續探索和自主學習的興趣？該門課程具有清晰的教學目標，即透過講解漢代至唐代絲綢之路東段的發展及文化交流，讓學生了解古代中國及其與周邊地區的關係。課程涉及歷史、宗教、禮法、藝術、建築、考古、商貿等多個範疇，致力於探索古代中國的世界主義和文化發展。本課程透過講授絲綢之路相關知識，培養學生觀察發現、邏輯思考、圖像解讀和文本分析這四項學習技巧。學生修讀本課程需完成課堂參與、口頭報告、期末測驗及學期論文。學期論文分三稿提交，其中前兩稿由中國語文教學中心或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就文法進行批改及評分，第三稿（即最終稿）交由授課老師進行全面評閱。除滿足中英文閱讀及寫作要求之外，課程的願景是期待學生能夠：（1）深入了解古代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2）認識古代中國的世界主義特徵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3）認知古代中國與歐亞其他國家的文化互動；（4）培養搜尋、觀察和分析文獻文物的技巧；（5）以全球視野觀察古今聯繫，養成思辨能力。¹⁶ 為實現課程願景和學習目標，課程內容的設計需要體現清晰緊湊的邏輯和豐富廣泛的議題，同時需要能引起同學的自主思考。

在內容方面，本課程採用多議題、多角度的方式，全面展示陸上絲綢之路的特色和重要意義。第一講為緒論，重點引入「世界主義」概念，並提出認識絲綢之路的多元視角，請學生留意本課程與傳統中國古代史在學習方法上的區別。課程的主要內容以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為重點，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時間為線索展開秦、漢、唐三朝代的歷史，講解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和發展經過；第二部分以專題形式，探討絲綢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流及其對古代中國的影響；第三部分關注商業活動，讓學生體會古代絲路商人的貿易環境和經營智慧。課程總結部分涵蓋海上絲路的部分知識，重點講解陸上絲路向海上絲路的轉變，再總結不同形式絲綢之路的整體意義和影響，回顧中國在古代絲綢之路和全球交流中的角色（見下表）。

16 見理大 FH2C03「絲綢之路東段文化史」課程資訊表。2020 年 5 月更新。

「絲綢之路東段文化史」課程結構

第一講 緒論 世界主義與文化交流：理解絲綢之路的新角度	
第一部分 秦至唐代的中國文化及陸上 絲路簡史	第二講 秦：一統六國及兵備大軍
	第三講 漢：科技、儒學及絲路開闢
	第四講 唐：盛世文明及都城長安
第二部分 陸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	第五講 文明交匯：中國與歐亞諸國的文化往來
	第六講 生活時尚：絲路新風與長安日常（動手活動：試穿漢服）
	第七講 絲路藝術：敦煌壁畫與文化瑰寶
	第八講 物質傳播：從地方特產到絲路商品
	第九講 宗教哲學：儒、釋、道及其融合
第三部分 絲綢之路上的商業活動	第十講 絲路入長安：邊關風貌與文化傳承
	第十一講 經營智慧：絲路東段的商人及商業活動（小組活動：古代貿易行程設計）
第十二講 海上絲路：古代全球交流的另一路徑	

本課程的特色是跨學科、多議題、廣泛的知識面和多樣化的資料。學生在學習本課程的過程中，可以鍛煉融匯貫通能力和整合能力，並全面了解絲綢之路的發展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

(二) 教學實踐

在理大講授人文課程，需因應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結合理論講解、課堂互動、動手實踐、小組討論和文化考察，培養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學生的特點決定本課程應採用何種方式切入。修讀本課程的同學各自的學科背景和知識儲備差異較大，熟讀歷史及古文者有之，但亦不乏在中國歷史及文化方面基礎比較薄弱的同學。部分同學可能最初只是為了滿足學分要求而報讀課程，亦有同學可能認為歷史文化科目較為枯燥且無實際功用。在教學設計時需意識到同學的特點和想法，因材施教，

讓他們明白歷史有其邏輯、古人的智慧和努力值得今人思考借鑒，以問題為課程線索，鼓勵學生將歷史學習視為類似偵探破案的過程，引起他們主動探索的興趣。為了消弭學生心中對歷史可能存有的距離感，我會借助日常所見，拉近學生與歷史的聯繫，引導他們先建立感性認知。其中一個方法是透過網上小遊戲，請同學舉出一種喜歡吃的水果，我再逐一分析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果品原產地在哪裏、從何時開始進入中國、以何種路徑進入中國。這樣的互動既增加同學在課堂的參與度，也讓同學明白學習歷史既有趣亦可互動，知道自己日常接觸的多種食物、音樂、哲學智慧等都來自課程即將講授的古代絲綢之路，並以此作為學習切入點。在同學對課程稍有興趣和感性認知的基礎上，展開具體主題就變得相對容易和順暢了。教學時，我注重講解歷史文化基礎知識，同時在講解每個議題時都以兩至三個互相關聯的問題為重點，引導同學對重要問題進行有邏輯的深度思考和探索。

在面授模式時，課程分別在第六講（生活時尚）和第十一講（經營智慧）安排兩次切合議題的學生小組活動。「生活時尚」議題準備男裝及女裝的古代服飾，邀請學生試穿。漢服近幾年在內地掀起熱潮，而其本身具有豐富的文化含義和穿著規制。這項活動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在親身體驗漢服的過程中對古代服飾的特點有深刻印象，更加了解古人的風尚、衣著習慣和民族融合的衣飾特點。「經營智慧」議題則請同學模擬古代商人，根據已經講解的絲路地理環境、綠洲驛站分佈、風險管理、技能培養等知識點，為古代長途貿易商旅設計出從長安至撒馬爾罕(Samarkand)的貿易行進路徑和簡要貿易策略。這項實踐活動需要學生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訓練其協作能力和解難能力。

除理論學習和課堂活動外，本課程與西安交通大學勵志書院共同開展「萬人計劃」暑期合作項目，學生有機會在國家教育部的支持下赴西安考察學習，與內地學生交流互動，實地參觀昔日長安古城的歷史遺存

糅合人文與理工的嘗試 ——從唐文治棄官從教說起

劉繼堯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
及文化學系

一、前言

中國自 19 世紀中葉以後，開始出現多方面的轉變，上至軍事與文化，下至飲食與服飾，似乎展示着一種迥異於昔日的時代將會來臨。李鴻章 (1823-1901) 曾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繪當時的劇烈變化，而對於已進入近代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焦點問題已不是「該不該變」，而是「如何變」和「怎樣變」。特別是西洋知識的傳入，對於中國傳統知識結構造成嚴重衝擊，文化之存續與否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近代知識結構的轉變，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可謂相當重要的表徵。中國文化的知識結構與分類——經、史、子、集，過渡至近代的學科與知識系統——文、理、法、商、醫、農、工。這一轉變，將中國的學術傳統納入了西方的學科制度內，中國學術亦隨之而被重塑。¹ 在重塑過程中，中學與西學出現相當程度的角力。時人對此已有所察覺，例如孫寶瑄 (1874-1924) 在其日記中寫道：

保存國粹主義，為今日一大問題。國粹者何？即本國之文字是也。游學東西歸者眾矣，其於本國文有不能綴句者，本國經傳歷史及現今情勢有茫乎不知者，……彼既不解國學，則於本國數千年來舊社會中組織之現象，以及性質風俗，皆不能詳究深考，……蓋知有他國，而不知有本國，是國未亡，而先自滅者也。烏乎可！²

* 筆者衷心感謝韓孝榮教授及編輯悉心修正與潤飾文句、指正錯誤及提供寶貴意見。

1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中學除了是一種知識，還涉及文化延續的問題，因此在晚清出現知識轉型的同時，國粹思潮應運而生，章太炎 (1869-1936)、劉師培 (1884-1919)、鄧實 (1877-1951) 等推動國粹，文化延續與文化認同是相當重要的元素。³ 在西學不能不講、中學不欲偏廢的前提下，在近代，曾有一種構想，那便是通過教育，糅合中學與西學。本文以唐文治 (1865-1954) 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在這方面的嘗試。

二、唐文治——從出仕而轉向教育，工業人才與文化傳承

唐文治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出生於江蘇太倉。先後授業於其父唐受祺 (1841-1924)、⁴ 王祖畚 (1842-1918)、黃以周 (1828-1899)、王先謙 (1842-1917)，由此窺探訓詁考據、性理詞章之學，而詞章之學更成為唐文治日後糅合中西、延續文化的重要途徑。1892 年，唐文治中進士，由此展開其官場生涯。從 1892 年到 1907 年，唐文治先後供職戶部、外務部、商部。從 1907 年開始，他轉投教育工作，就任上海實業學校監督（現今的交通大學，為便行文，下文稱唐文治為交通大學校長⁵）；後在 1920 年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⁶ 若以職業區分，唐文治的前半生在官場，後半生則在教育界。這一轉向，呈現晚清部分士人的經世志業，以及調適中西的嘗試。

2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939。

3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何曉明：《返本開新：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新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鄭大華：《中國近代思想脈絡中的文化保守主義》（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4 唐文治的思想對中國文化的態度，與其家庭背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詳見呂成冬：〈唐文治家族研究（1841-1954）〉，（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5 「交大前身為 1896 年盛宣懷奏開的南洋公學，是一所旨在『專學政治家之學』的法政類學校。1905 年改隸商部，校名更為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轉而培養從事工商實業的專門人才。1906 年改屬郵傳部，辦學方向上側重於交通工程專業，……然因人事更動頻繁，校務處於無序狀態，改辦工科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唐文治到任後，……集中辦理與交通有關的工程專業」，詳見歐七斤：〈試論唐文治工程教育中國化的思想與實踐〉，《高等理科教育》，第 5 期總第 99 期（2011 年），頁 152。由於校名屢屢變更，為行文之便，內文統一稱為「交通大學」。

6 唐文治主持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其名字亦屢有變更，詳見吳涪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台北：政大歷史系，2008）。

唐文治從出仕為官，轉而主持教育，學界對這種轉變的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與討論，其中包括對清廷的失望、人事的瓜葛、另闢途徑實現抱負等。⁷ 尤其另闢途徑實現抱負一說，道出唐文治不是消極地離開官場，而是在中國近代轉型之時，積極地以另一種方式實踐抱負。⁸ 結合唐文治的生平行誼，此說可謂道出唐文治的心聲。若由此追溯，在晚清不同類型的學校之中，唐文治何以選擇交通大學？中學的危機與工業人才的缺乏，是理解唐文治棄官從教的兩條線索。

1894 年，唐文治在〈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中寫道：

夫士生今日誠不可不習西法。然使專習西法而廢制藝，則綴學之士勢必束四書六經而不讀，舉周公孔孟之微言大義、禮法制度，所以維繫人心者，一切唾棄淨盡，則中國之去人倫無君子，其幾蓋不遠矣。⁹

唐文治與部分晚清的知識分子，存在同樣的心境，認為西學不能不學而中學不能中斷，否則寄寓其中的文化與價值，將會遠去。1899 年，唐文治對於中學的存廢，愈見擔心，甚至認為中學已陷入滅絕的危機：「今日之勢與其使西學淆亂吾中學，而士林被塗炭之災，何若使中學囊括乎西學，斯吾道尚不至有絕滅之懼」。¹⁰ 可是，如何安排中學與西學，才能讓「中學囊括乎西學」？1902 年的出洋經歷，令唐文治得以了解西方教育與學制。例如在比利時，他了解到：

7 有關唐文治棄官從教的討論，詳見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74-75；余子俠：〈唐文治與清末商政〉，《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 44 卷第 3 期（2005 年），頁 100-102；吳涸南、胡達祥：〈唐文治「棄政」從教育之緣初探〉，《作家雜誌》，第 12 期（2007 年），頁 62-63；張雪永：〈唐文治棄官從教析論——兼與蔡元培比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 10 期總第 218 期（2009 年），頁 254-257。

8 張雪永：〈唐文治棄官從教析論——兼與蔡元培比較〉，頁 254-257。

9 唐文治：〈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茹經堂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 32-33。

10 唐文治：〈與友人書〉，《茹經堂文集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四，頁 719。

余考比國學堂共六千九百五十六所，為大學者二歲費二兆二億佛朗，為中學者一百五十歲費三億佛朗，……大學為專門者九，曰政治、曰律例、曰格物、曰教術、曰醫學、曰化學、曰礦學、曰電學、曰橋路工程學。大學惟男子與焉。中學男倍於女，小學男女半，中學有男女師範學堂各二。小學有男師範學堂十九，女師範學堂三十四。師範學堂卒業給領文憑，始得充教習……¹¹

這次外遊，除了比利時外，唐文治還考察了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其考察的記錄，並非浮光掠影，而是帶有重點，特別關注各國學堂的數量、學費、科目、師資、考核方法等。各國的教育動態，成為唐文治日後主持交通大學可資憑藉的經驗，同時呈現唐文治轉向教育的動機。他希望透過教育，一方面培養實業人才，一方面延續中國文化。這一點，唐文治在〈學校培養人才論〉中曾作明確的表述：

今者科舉停，憲政舉，天下之人才，將盡出於學校，……蓋自教化不同，天下多得一，新舊不相保，則所以正其本而清其源者，惟視乎培養之道。¹²

上文寫於 1909 年，唐文治主持交通大學之後；「正其本而清其源」，可謂道出其心聲——通過教育，讓中國文化得以延續，並培養新型人才。這些新型人才所具備的西學知識則以工科為主，而工科又與商業活動的開展密不可分。

11 載振：《英報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 198。有關《英報日記》的寫作，唐文治的年譜記：「余仍回外務部供職。……余公務之暇，為載大臣編《英報日記》成，進呈御覽」，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頁 47。由此推測，《英報日記》的編撰，唐文治有相當大的參與，是以部分研究者論及《英報日記》時，唐文治成為作者之一，例如余子俠寫：「唐文治在第 2 次出洋歸國後又協同載振交出了一份最佳的考察『論文』——《英報日記》」，余子俠：《工科先驅 國學大師——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48。

12 唐文治：〈學校培養人才論〉，收入唐文治著、陸遠編：《大家國學·唐文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 206。

唐文治遊歷海外時，除了注意教育，還關注各國興辦商業的經驗。例如，在美國，他留意到：「其獎勵工商之法，一曰免稅、二曰賽會、三曰獎給金銀銅三等獎牌、四曰專利。此外復准民間自設工商學會，祇須將章程稟官查驗存案，並准地方官入會為會友，其提倡可謂至矣」。¹³又例如，在比利時，他了解到：「余聞比國稅薄工廉，獎勵工藝。故工廠雲連，進步甚速，……按其所征，大率取於富民者多，取於貧民者寡，又多方為樂事勸工之法，以期藏富於民。故其民富而國用因以日饒」。¹⁴唐文治認為各國的富強與其商業發展，有相當重要的關聯。因此，歸國以後，唐文治認為中國急切所需者為興商務、辦路礦、開學堂。¹⁵

其時，適逢清廷為了發展商業，通商惠工，以此作為富國之基礎。在這背景下，廣東客家華僑巨商張振勳（張弼士，1841-1916）向清廷提出多項有關振興商業的條陳。¹⁶對於張振勳的條陳，唐文治代載振（1876-1947）作覆，草〈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在摺中，唐文治點出振興商務之重要：「竊維近世之言理財者，莫不以振興商務為急，……故欲求商務之興盛，在先求工業之精進；欲求工業之精進，在先求農業之振新」。¹⁷他認為商、工、農是振興經濟的關鍵，而鐵路則充當運轉的作用：

臣等伏查商務以開礦種植諸事為樞紐，而開礦種植諸事又以鐵路、支路為樞紐。西洋各國鐵路密佈如網，火車往來如織。蓋以貨物充切，即不得不多造支路，以為流衍轉輸之地。……今由商部設立鐵路公司，……¹⁸

然而，當唐文治任職於商部，試圖將理念轉化為現實時，便遇到相當困難，原因之一在於：

中國工藝尚在幼稚之時，如章程所載，製造、輪船、鐵路、橋樑，以及電機、鋼鐵，各項一時間尚難得其人。¹⁹

日後，當唐文治主持交通大學時，便致力於發展四個專業：鐵路、電機、船政、鐵路管理。這些專業的成立，唐文治並非隨意選擇，而是出於實際需要。為解決人才不足，唐文治在早期曾提出不同的建議，以解燃眉之急。例如，他在1904年的〈訂立商勳摺〉中曾建議：

凡製造輪船，……與外洋輪船相埒者；能造火車、汽機及造鐵路，長橋在數十丈以上者；能出新法，造生電機及電機器者，均給一等商勳。²⁰

1906年，唐文治在〈請派遣學生出洋片〉建議：

臣部變通舊制，採用曾經出洋游學人員，勉力搜羅，終嫌缺乏。欲圖久遠，不能不預為綢繆。時事日艱，需才孔極，惟有先就各國留學生之肄業，習政治、法律、商務、理財者，詳加遴選，無論官派私費，但係品詣端正，程度較深。即由臣部酌給學費，異日畢業回國，專歸臣部委用。……此不過僅濟一時之急，而不足為經久之謀。²¹

13 載振著；吳仰湘點校：《英軺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6），頁176。

14 載振：《英軺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202-204。

15 黃漢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收入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集粹·教育卷》（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5），頁124。

16 余子俠：《工科先驅 國學大師——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頁56。

17 唐文治：〈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茹經堂奏疏》，頁93-94。

18 唐文治：〈議覆張振勳條陳商務摺〉，《茹經堂奏疏》，頁124-125。

19 唐文治：〈訂立商勳摺〉，《茹經堂奏疏》，頁168。

20 唐文治：〈訂立商勳摺〉，《茹經堂奏疏》，頁169-170。

21 唐文治：〈請遣派學生出洋片〉，《茹經堂奏疏》，頁204-205。

唐文治希望借鑒同文館之先例，派學生留學西洋，以解人才缺乏之急。然而，獎勵具備技能者以及擇優派送留學者，只能應一時之急。「經久之謀」還是需要「預為綢繆」，在國內培育相關人才，始能為治本之法。由此可知，唐文治已洞悉三個問題：

- 一、中學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出現斷裂的危機；
- 二、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發展，尤其是發展鐵路、電機等項目；
- 三、缺乏發展所需的人才。

如果出現一個方案，可以同時解決以上三個問題，為國家培養中西兼備的人才，對唐文治來說，無疑是一個絕佳的選擇。1906年9月，清廷改商部為農工商部，²²任唐文治為署理尚書。然而，出於種種原因，唐文治自知即使留在朝廷並身居高位，也再難展抱負。²³唐文治在其自訂年譜中，於1907年5月的紀事條下，訴說了自己的感受：

五月，載尚書為人劾，怏怏辭職。奉旨以溥仲魯尚書名頤代之，亦宗室也。論者謂農工商部一蹶不振矣。是時立憲並未實行，大局岌岌可危。南皮張香濤制軍名之洞、項城袁慰亭制軍名世凱，皆入贊軍機。余嘆曰：國力盡矣！²⁴

一句「國力盡矣」，道出唐文治的複雜心情，既然身在朝廷已無可作為，倒不如重新考慮去向，另開途徑。因此，教育無疑是一個相當合適的新方向，可以使他有機會實現抱負，為國家培養中西兼備的人才。於是，1907年，當郵傳部奏派唐文治為交通大學校長時，唐文治便以其

22 關於商部改組成為農工商部的原因，丁健指出：商部成立後，不僅與六部矛盾重重，而且與新設的外務部，也不能很好地處理關係，在職權運作上，陷入困境。於是，清廷在實行憲政時，在中央改革官制，把工部併入商部，正名為農工商部，詳見丁健：〈清末商部改組為農工商部原因考述〉，《蘭州學刊》，第4期（2011年），頁125-129。

23 余子俠：〈唐文治與清末商政〉，《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44卷第3期（2005年），頁95-102。

24 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頁58-59。

父親年老及思鄉為由，欣然接受。²⁵唐文治以教育，作為實現理想的途徑，呈現晚清通過興學，從而強國的脈絡。而唐文治的辦學，又寄寓了文化傳承與文化認同，這點在下文再述。²⁶

三、糅合中學與西學的嘗試——專科與國文

唐文治上任之後，首先整頓紀律，改變前任監督久不到校視事的習慣，²⁷以開展新的氣象。其後，唐文治着手籌劃交通大學的不同專業。第一個便是鐵路專業。1907年9月，唐文治就任不久，便上書〈諮呈郵傳部將鐵路班改為鐵路專科〉：

路政利商便民，尤為實業之基礎，近來日益發達，復得本部提倡維持，儲才致用，商民觀感，忭頌同深。本監督接收實業學堂以後，詳考該堂上院專門設有鐵道一班，洵屬當務之急。唯其規制簡略，必須大加擴充，俾至詳備。²⁸

25 「溥仲魯尚書親來請余為北京實業學校監督，堅辭之。鐵寶臣尚書名良，欲請余為北京貴胄學校監督，亦辭之。……八月郵傳部陳玉蒼尚書奏請余上海實業學校監督（原名南洋公學）。因念吾父年高，思鄉慕切，因允就職」，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頁59。

26 有關晚清的教育研究，可以參考左松濤：《近代中國的私塾與學堂之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劉紹春：《晚清科舉制的廢除與新教育的興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Bai Limin, *Fusion of East and West: Children, Education, and a New China* (Leiden: Brill, 2019); Ye Wangbei,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Teaching and Teachers*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有關辦學與文化認同的研究，可以參考陳銳：《馬一浮儒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吳淦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1963* (Leiden: Brill, 2012)。

27 唐文治：《茹經堂自訂年譜》，頁60。

28 唐文治：〈諮呈郵傳部將鐵路班改為鐵路專科〉，收入劉露茜等編註：《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5），頁11。